

阿·托爾斯泰著

# 苦難的歷程

一

平明出版社

## 阿·托爾斯泰論

阿·邁耶斯尼柯夫

阿·托爾斯泰作品的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他對於在不斷進步中的祖國的熱愛。

在他背後有着他祖國的偉大人民的偉大歷史。當他注視到俄羅斯的城市，他就彷彿看見遠祖在森林中開闢一塊空地，搭蓋第一所木屋；當他凝望着被拖拉機犁過的田野，他就想像到最初的拓荒者第一次用犁耙耕地。『祖國』，阿·托爾斯泰寫道，『是從幾百年的深底裏出來、穿過大地、走向它所希望的前途去的人民，它相信這個前途；而且爲自己和子孫孫建立這個前途。它是一股永恆的人民之流，永遠在死亡，永遠在誕生，永遠在持續他們自己的語言，他們的精神和物質的文化，以及那不屈不撓的信心。他們相信在太陽底下有這不可剝奪的立足的權利。』

作爲一個作家的阿·托爾斯泰的一生，是充滿着艱苦和困難的。他生於一八八三年。

他父親是個地主。他自己在薩瑪拉省的遙遠的草原上，在他母親的第二個丈夫住的那個小村子裏度過他的童年。地主和富商是他周圍的人物，可是他自己家裏的人却十分喜愛前

一世紀六十年代的民主俄羅斯文學。他母親本人便是一位作家，因此這孩子從小就讀了很多的書。

阿·托爾斯泰先在一個中學裏唸書，後來進了聖·彼得堡工學院。「像別人一樣」他在自傳中寫道，「我參加了學生運動和罷課。……」

一九〇七年，阿·托爾斯泰二十四歲時，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一本題作抒情詩的詩集。『這是一本很糟的書，既幼稚而且又是舉倣人家的，』作者自己後來這樣說。這書充滿着文字上的矯揉造作，那正是當時挺流行的頹廢派的精神。不久，作者自己就把存書買了回來，將它們統統燒掉了。

阿·托爾斯泰很快就克服了頹廢派的影響。

在他富有創造性的鑽研中，作者便轉向於民間文學。他的第二本也是最後一本詩集藍色河流後面是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關於這本著作，他在一九四四年時說：『直到今天我並不把它丟棄。這藍色河流後面是我第一次從事俄羅斯民間文學，俄羅斯大衆藝術的成果。』

阿·托爾斯泰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古老的鐘樓，發表於一九〇八年，這就開始了他作為一個散文作家的寫作生活。第二年所寫的競賽者和碧玉筒，他後來說是標誌着自己認真從事小說寫作的開始。

這位年青作家最初的努力，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早在一九一〇年，瑪克西姆·高爾基就促起盧那卡爾斯基的注意，說他是「一位毫無疑義的大作家，他極其忠實地描寫了當代地主階級的精神與經濟的解體。」事實上，阿·托爾斯泰在革命前寫的最優秀的作品，包括以老菩提樹下命名的許多故事，以及怪人和跛老爺兩篇小說，都採用了這個主題。阿·托爾斯泰又把自己對於俄羅斯地主生活的觀察，歸納在一篇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所寫的、題作拉斯焦金的遊歷的短篇小說裏面。他的材料都取自家庭軼事、回憶、和個人的觀察。同樣的人物出現在一篇篇的小說中，而情節也都安排在同樣的莊園裏。一篇篇分散的小說，實際上祇是描寫革命前夕貴族生活的、一篇包羅豐富的小說的章節罷了。

繼承着俄羅斯批判的現實主義的精神，阿·托爾斯泰暴露了貴族的虛誇、怠惰、與殘忍。所有被阿·托爾斯泰所描寫的這一階級的發言人，都常常講起公平、人道、和正直，還常常以為自己是心地挺崇高的人，然而他們却做出了最醜惡的行為。阿·托爾斯泰在革命以前所寫的最有名的作品之一，跛老爺中的主人公，阿歷克賽·克拉斯諾普爾斯基王子就是這樣，這個人物具備着沒落貴族的一切特徵。他相信自己的性格是機警而聰明的，然而阿·托爾斯泰却把他表現為一個僞君子。

在革命以前所寫的作品中，阿·托爾斯泰對戀愛問題非常注意。在他看來，愛情是讓  
人把最優秀的品質顯示出來並且使人高尚的一種東西。阿·托爾斯泰的戀愛觀完全不同

於頹廢派的色情主義，相反地，那是人類的最高標準。同樣，頹廢派的神祕主義和他們的憂鬱的悲觀主義，對他也是格格不入的。他發現他的周圍環境非常悶人，可是他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却並沒有談到，他的現實主義僅僅做到批判社會，而沒有指出改變現狀的道路。他的譴責貴族，是倫理的而不是政治的。

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給阿·托爾斯泰一個深刻的印象，而且無限地擴大了他的眼界。到了一九一七年，他不再是描寫伏爾加的地主貴族和克拉斯諾普爾斯基王子們的那樣一位作家了。他已經到過前線許多地方擔任記者，這位渴想調查現實人生的年青作家的視野，已經無比地擴大了。他後來在自傳裏，描寫到他在革命以前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所經歷的危機，因為那時候他把關於貴族沒落的題材都寫完了。「我此刻面臨着破產」他寫道。

「我用當前的主題所寫成的長短篇小說，都是失敗的作品，都不是典型的。現在我明白為什麼會那樣了。原來我繼續生活在象徵派的圈子裏，他們的反動藝術不可能反映暴風雨似地逼來的革命前夕的時代。象徵派退入了抽象和神祕主義裏去，讓自己隱避在象牙之塔裏，在那裏他們全副度過那不可避免的事情。我愛人生，我以全身心反對抽象和唯心的觀點。我瞭解我不能夠老是那樣子下去。我工作得更努力，可是結果却是可憐的：我看不見國家的生活和人民。直到世界大戰爆發，我到前線擔任戰地記者的時候，我纔看見了真實的人生，我自己纔參加到生活中去，剝掉我扣得緊緊的象徵派的黑外衣。我看見了俄羅

斯的人民。」

阿·托爾斯泰此後的路程是艱苦而充滿着矛盾的。他一步一癟的犯着嚴重的錯誤，痛苦地摸索着解除他創作危機的道路。既是一個貴族出身的作家，他就需要相當的時間，纔能瞭解人民，瞭解他們的希望。正因為這樣，他在十月革命以後曾經到國外去住了好幾年。然而被革命所推翻的世界，並沒有引起這位作家的同情。即使在起初祇用他藝術家的本能，阿·托爾斯泰也感覺到那些以獸類的個人主義來反對革命的人們是卑不足道的。根據他自己的體驗，他在國外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艱苦的一段生活時期。『在那兒我開始明白做一個流亡者，一個離棄祖國，一個在任何情形下而不為任何人所需要的人的滋味了。人覺得生活空虛而無聊。』

就在這樣的心情中，接着幾本比較不重要的著作（可是我們必須提一提他在一九二〇年寫作的尼基達的童年，因為那是一篇用現實主義手法生動地處理兒童心理的作品，在俄國文學史上佔着一個輝煌的地位）阿·托爾斯泰開始寫他有名的三部曲苦難的歷程的第一部，兩姊妹。在這個三部曲上，作者花了二十二年的時間，從一九一九年開始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正當納粹軍隊略侵蘇聯的那一天完稿。

整個三部曲是描寫蘇聯人民的一部英勇史詩。從一齣家庭的戲劇發展成爲一個主要

的歷史性的場景，這小說包含着社會的遼闊的階層。如果人民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的傳統問題，是第一部中的主要論點之一的話，那麼在以後的兩部中，人民本身所發生的作用就越來越大了。阿·托爾斯泰生動地描寫了革命怎麼樣使人們淨化，怎麼樣加強他們與整個人民的聯繫，以及怎麼樣賜給他們以真正的幸福。

兩姊妹的題詞——「啊，俄羅斯的大地！」是阿·托爾斯泰從俄羅斯民族史詩伊·戈爾王子出征記裏摘引得來的。在這個詩句裏，響着警醒、勸戒、惋惜和熱愛祖國的旋律。

這小說的開場，是在革命前的聖·彼得堡。不過阿·托爾斯泰對於聖·彼得堡的情況，並不全面知道或瞭解，因此他特別着力於描寫從資產階級和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的生活，因為那是他自己出身的環境。對於這些知識分子，他宣佈了無情的判決。「有時候我凝望着海面這樣想，」小說裏的人物之一，律師史摩珂甫尼考夫說，「現在有一個俄羅斯，它耕田、畜牧和採煤；它紡織、冶煉和建築；也有人民，他們逼着俄羅斯去做這一切的事情，可是我們，這批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的貴族，却跟這個俄羅斯一點兒關係也沒有，除了她把我們養活了。我們都是些蝴蝶。這是一個悲劇。譬如說，假如我也想去種種蔬菜，或者做一點其他有用的工作，結果是一定不會有什麼成就的。我這一生，命定着祇能做一隻翩翩的蝴蝶了。」阿·托爾斯泰揭發了這些與人民脫離的「國家的知識分子貴族」的極端的空虛。

在詩人貝索諾夫身上，他嚴厲批判了頑廢派的本質，這些人的生活祇有「醉酒、戀愛，和精神上的苦惱」，他們祇是設法找尋什麼東西來刺激疲憊的神經。

那個時候，阿·托爾斯泰十分明白那種革命前的俄羅斯的生活，是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了，他也知道把一切都弄乾淨的革命的暴風雨一定會到來，一定會把史摩珂甫尼考夫和貝索諾夫們的世界掃除淨盡，可是儘管這樣，他却並不會瞭解將來的生活，到底該怎麼樣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革命以前的作品中，阿·托爾斯泰主要地祇限於描寫反面的人物，而在兩姊妹裏面，他却開始表現了正面的主人公。

這些人物之一便是年青的姑娘達莎，她的許多特點——真誠，靈魂的純潔，感情的深厚——使人回想起古典作品中所創造的、最優秀的女性人物的傳統美德。阿·托爾斯泰描述她發展的過程。她到聖·彼得堡的時候，對人民懷着挺天真的想法，在她心目中，人祇有兩種：好的和壞的。生活在頑廢派影響的腐蝕的氛圍中，她設法保持她道德上的純潔，愛上了一個很有出息的男人。不錯，在第一部小說中，達莎的確還距離人民很遠，她還不能跟，譬如說，涅克拉索夫在一首描寫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的長詩俄羅斯女人中所表現的女性典型相比。

另一個正面的人物，是爲達莎所愛上的工程師戴勒琴。他很誠懇、樸實、和快樂，在工

廠裏得到工人們的推重，而且被工人們認為是自己人。戴勒琴瞧不起史摩珂甫尼考夫和貝索諾夫那班人，可是社會的政治機構那時候遠沒有跟他發生什麼關係。

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戴勒琴上了前線，在那兒（也跟阿·托爾斯泰本人一樣）他開始更瞭解了俄羅斯人民。戴勒琴被德國人所俘虜，可是他勇敢地忍受了被俘的屈辱。最後他跟敵人作了一次英勇的鬥爭，他終於逃出來了。他跟他的人民一同遭受的困苦與艱難，擴大了他的眼界，他對於二月革命以後，着手制訂一種摹倣英國式的憲法的、那批自由主義的教授們，無比的憤怒。「他們不瞭解俄羅斯，那些教授們！」他憤怒地告訴達莎。「他們都誤解了俄羅斯的歷史。俄羅斯人民可不是什麼裝作聰明的空想者。俄羅斯人民是一種有感情、有天分、而且堅強的人民。俄羅斯農民穿着韌皮鞋子，一路步行到太平洋去可不是偶然的。……可是這些教授們，却要用一部像樣的憲法來遏制我們人民反抗的洪流了。」阿·托爾斯泰表現了在工程師戴勒琴的思想中，祖國的命運現在已經湧現得多麼的偉大。

在這一方面，作為與戴勒琴的對照，軍官羅希慶的出現是很獨特的。在三部曲的第一部裏，羅希慶代表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俄羅斯在一九一七年已經滅亡了。

爲錯誤的榮譽心和責任心所激動，羅希慶起初參加在白軍的隊伍裏，跟他自己的人民作戰。後來，他所有的理想全部粉碎了。他的轉變，被作者用一種十分令人信服的手法，描寫在三部曲的第三部裏。

△阿·托爾斯泰寫兩姊妹的時候，他還沒有正確地瞭解他的人民，特別是人民的先鋒隊工人階級。在小說中正面理想的處理上，他又回復了他的舊觀點。他好像仍然認爲戀愛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我們不妨說這第一部小說的基本哲理是在本書的結尾表現出來的，當羅希慶跟達莎的姐姐卡嘉說話的時候，他說：『歲月會消逝，戰爭會結束——革命會沉寂下去，可是祇有一樣東西是永遠存在的——那便是，你的柔和而溫順的親愛的心。』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作家俱樂部特別爲討論苦難的歷程而舉行的一次晚會上，阿·托爾斯泰曾經爲這第一部小說，說過這樣的話：『兩姊妹裏並沒有寫到遠景。那時候我還是很盲目的。這部小說不是歷史性的。它不過是個人對於那個時代的一種觀感罷了。』過了五年——那是多麼重要的五年——阿·托爾斯泰纔開始寫這個三部曲的第二部。他回到祖國還沒多久，那時候他就在完成十月革命的人民中間。生活而且工作着。他熱心地研究了他親眼看見在他周圍進行的鬥爭中所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

小說一九一八年一部分表現了跟兩姊妹中幾個人物的衝突。在兩姊妹中，戴勃琴和達莎，羅希慶和卡嘉，都認爲不管戰爭與革命，戀愛和個人幸福總是人類生存的基礎。而

在一九一八年裏，阿·托爾斯泰指出了如果跟國家的幸福相抵觸，那麼個人的幸福將是多麼的短暫。儘管在飢餓的彼得格勒，戴勒琴對她怎麼樣的關懷體貼，可是達莎也畢竟跟他疏遠了。「別以爲我祇想過什麼舒服的生活，」她告訴他說。「沒有那樣的事。……可是我要生活，我要過一種精神飽滿的生活。……我不需要什麼麵包屑。……我再也不愛你了。……饒恕我吧。」戴勒琴本來夢想着要爲她築一個舒適的窠巢，他也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在這樣的時代，他還不夠偉大。」卡嘉和羅希慶的幸福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羅希慶曾經有一次說到卡嘉的心，是生平唯一的至寶。在內戰的路上碰到了卡嘉，聽到她反對他對於蘇維埃俄羅斯的不公正的判斷，羅希慶就跟她決裂了。戴勒琴和羅希慶都完成不了時代對他們的要求。

幾個主要人物的個人幸福都破滅了，因爲若要得到經得起最大困難的真正的持久的幸福，你就必須跟人民站在一起，而且一起受考驗。在一九一八年卷首阿·托爾斯泰挑了幾句俗諺作爲題詞：「在三次清水中沉沒，在三次血水中沐浴，在三次灰水中滾沸，我們就比純淨更純淨了。」

### 三部曲的整個性質都改變了。

歷史的事件現在出現到前面。一部描寫達莎和戴勒琴、卡嘉和羅希慶的小說，形成了一部描寫俄羅斯在暴風雨的一九一八年的史詩式的故事。它如今已是一部歷史小說，在

這裏面，一連串的歷史事件與幾個主人公的生活交織起來。阿·托爾斯泰繪出了一幅彼得格勒的場景，描寫了一次列寧在會上作了講話的人民委員會議。他敘述了一次反革命的暴動，鄧尼金軍隊的潰敗，德國人從里加到黑海的攻勢，黑海艦隊的鑿沉，和社會民主黨卡普蘭對列寧的惡毒的行刺。許許多多的事件。一個個歷史的場面，彷彿影片一樣在讀者面前閃過去。作者提出了無數複雜的問題，描寫了在全國各個不同地區所進行的、為爭取新的生活的鬥爭。這部小說，在作為一位藝術家的阿·托爾斯泰的發展上，劃出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阿·托爾斯泰在這小說裏，對於無產階級的描寫，也比他在第一部小說裏更深刻了。譬如說，戴勒翠靠了一個名叫華西里·魯勃列奧夫的工人的幫助，開始瞭解了革命的意義。可是儘管這樣，魯勃列奧夫在書裏也不過是個穿插的人物。作者對革命的敵人和找尋答案的知識分子，作了很清晰很逼真的描畫，可是對那些從事革命的人，工人和布爾什維克的性格，却仍然表現得很浮淺。阿·托爾斯泰所作的動亂的一九一八年的場景，分明不是完全的，因為作者還不能從工人階級的隊伍中，描塑出積極的英雄來。

必須注意，描寫列寧，讓列寧在小說的兩個場面中出現，這在蘇聯小說中還是第一次。阿·托爾斯泰動手寫他三部曲的最後一部陰暗的早晨，是在三十年代快要完了的時候。作為這一部的題詞，他選用了斯維耶托斯拉夫大公的英勇而聰慧的話：「不能以戰勝

者的身份活着，便應光榮地死去。』

像一九一八年一樣，陰暗的早晨也是一個史詩式的畫面。在這裏，你可以看到內戰的一些場面，看到反對馬蒙托夫、克拉斯諾夫、鄧尼金、許柯羅和梅—梅益夫斯基將軍們的白匪軍和外國干涉軍的鬥爭。察里津的保衛戰，白匪給毀滅性砲火的殲滅，和布瓊尼騎兵的工作行動，都給詳細細緻地描寫了出來。

在這一部中，工人階級構成了小說的主要部分。我們看到正直的知識分子在錯綜複雜的革命鬥爭過程中站到人民的隊伍裏來。達沙和卡嘉，羅希慶和戴勒琴，在革命的考驗中給淨化，受到艱難和困苦的鍛鍊，因而領悟到社會主義的偉大真理。這部小說的主題思想，表現在戴勒琴向紅軍士兵的一篇講話中：『這是一場我們必須勝利的戰爭；是一場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失敗的戰爭。如果人同野獸搏鬥，那麼必須勝利的是人。這裏可以給你們打一個比喻：一顆剛正萌芽的種子，有一點小小的根，它當然是既稚嫩又柔弱的，可是它會穿過堅硬的黑土，甚至還會推開一塊石頭。在一顆正在生長的種子裏，包藏着一切新生的力量；那是卓絕的，那是不可被遏止的。在一個鬱悶陰暗的早晨，我們出去作戰，為了爭取一個光輝燦爛的白天，去打擊那些要它成為像強盜們所喜歡的、那種最黝黯的黑夜的敵人。可是不管他們怎麼樣，即使他們存心惡毒，白天也一定會到來的。』

列寧在他不朽的著作偉大的創舉中，曾經說到新事物的萌芽，出現在蘇維埃人民日常

工作中的共產主義的萌芽。在他的小說中阿·托爾斯泰表現了國家的社會改造的複雜過程，以及這些新事物的萌芽怎麼樣自己發展和獲得勝利。

作者告訴我們，他的主人公們是怎麼樣得到真正幸福的。戴勒琴和羅希慶爲了爭取正義的勝利，參加在紅軍的隊伍中作戰。一度爲怠惰的生活嬌養壞了的卡嘉，變成了一個人民教師——而她在勞動中發現了多麼崇高的詩意！達莎回到戴勒琴身邊，消除了以前的恐懼，再也不去莫名其妙地追求什麼模糊而縹渺的東西了。她爲人民謀福利的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職業。「我再也不向海霧凝視了，」她說。「我祇要愛，我祇要工作。」

這部小說的洋溢着樂觀主義的收場，在現實主義方面是令人鼓舞的。戴勒琴、羅希慶、卡嘉和達莎在莫斯科大戲院裏。天氣很冷，空氣中都是觀衆吐出來的霧濛濛的水汽，而電燈就在這重迷霧中慘澹地發着光。列寧和斯大林坐在主席台上，工程師克爾齊柴諾夫斯基穿着一件皮大衣，執着一根很長的指鞭，正在作一個關於電氣化的報告。當演講者在地圖上指到未來的建設工程的地點的時候，光明的電燈全都亮了起來。照亮這張地圖所需要的電流，差不多是莫斯科電力廠所發出來的電流的總量。連克里姆宮裏部長們的辦公室裏，除了每個房間祇開一盞小小的電燈以外，所有的電燈也全給關滅了。然而儘管這樣，所有坐在大戲院裏的人，却都知道將來一定會實現像列寧所說那樣的生活。「你現在總可以知道，」羅希慶跟卡嘉說——他這樣說的時候，表達了大家的感情：「我們一切的努力，我

們所流的一切的血，和我們一切無名的、無言的苦痛，有著多大的意義了吧？我們將要重建這個世界，把它改造成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所有在這個大廳裏的人，都願意為這個而獻出他們的生命。這並不是空想——他們可以給你看那些創疤和藍色的彈痕。這就發生在這兒，在我的祖國，而這就是俄羅斯！」

一九四三年，阿·托爾斯泰把這部小說怎麼樣寫成的經過告訴讀者，他說：

「苦難的歷程是作者的苦難、希望、歡樂、挫折、失意和得意的歷程，是他對於一個偉大時代的理解。這個時代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頭一天為止。」

阿·托爾斯泰是一個驚人地多才多藝的作家。他用了許多文學形式來寫作，而且為了要瞭解他的時代，他接觸了當時的一切急迫問題。

正當祖國在戰爭上獲得了勝利，接着就全力從事於恢復經濟的時候，阿·托爾斯泰回到了蘇聯，他用清醒的眼光，曾經看見了戰後的西歐，以及他自己在這些年來跟他們生活在一起的西歐的人民。歐洲使他感到憎厭，因為它的驕傲，它的庸俗的短見的理想，人性的缺乏，和罪惡的繁衍。他曾經看見那種力量在成長，最後便產生了法西斯主義。在安東尼·李佛奧的兇殺中，他描寫了一個人為了金錢而殺死他伯父的故事。

在他一九二三年所作的牀底下找到的手稿裏，阿·托爾斯泰暴露了俄羅斯貴族流亡者的道德的極端墮落。

俄羅斯的流亡集團，包括沒有廉恥的冒險家和騙子們在內，他們的生活，他們的人格的卑鄙，和他們的精神的空虛，都是阿·托爾斯泰在一九二四年寫的、以激辣諷刺聞名的一篇有趣的小說霍夫曹洛夫奇遇記、又名伊比古斯的主題。

作者用驚險怪異的手法，這也不是僅有的一次。這一類小說的初期作品之一便是艾里達（一九二二年），它的背景是在火星上。在那篇作品中，他對處理革命問題作了第一次的、還不高明的嘗試。

十分流行的是他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一篇冒險小說，工程師迦林的雙曲線。就形式而論，特別是它的初稿，那簡直是一篇典型的偵探小說，裏面有神祕的兇殺，也有同樣神祕的失蹤、美麗的女人、勇敢的水手、和令人難信的豔遇，可是這一切却都攪雜着社會諷刺的成分。他以偉大的才具，描寫了一個名叫迦林的美國無冕之王。在這篇小說中，他暴露了美國資產階級民主的醜惡的一面，暴露了金圓的勢力和資產階級關係的卑鄙性。

小說的中心主題是工程師迦林的故事，他發明了一種熱射線，因此發了一筆大財，變成美國的獨裁者。雖然他支配了整個世界，可是迦林却並沒有找到幸福。迦林把它用來

反對人民的發明，落到了暴動羣衆的手裏，於是一次革命就把這個獨裁者給剷除了。

在這篇作品中，阿·托爾斯泰嚴格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資產階級世界的狗咬狗的法律，以及像迦林這樣典型的、企圖建立全世界的獨裁、陷全世界於修羅地獄、而使金圓幣霸的國際冒險家的妄想。

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阿·托爾斯泰着手寫作一部關於以改革聞名的俄羅斯沙皇彼得大帝的小說。阿·托爾斯泰描寫這個題材，這也並不是第一次，因為遠在一九一七年，他已經寫過一篇題作彼得的日子的小說。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直覺地認為描寫彼得的時代便意味着描寫俄羅斯的命運。幾年之後，他寫了一個劇本叫刑台。

不過在他早期的一些嘗試中，阿·托爾斯泰對這位改革者的沙皇，並沒有予以全面的和忠實的描寫，因為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重新表現那個時代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而並沒有表現那作為時代基礎的、意識與政治上的衝突。

在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開始時候重新回到這個主題，阿·托爾斯泰便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手法來處理了。他一方面在着手探測一個遙遠的歷史時代的深度，而另一方面却並沒有離開他當時的迫切問題。相反地，他設法解釋當前的問題，鑽研歷史的規律，以便更充分地瞭解在他祖國悠久的歷史中，今天這個時代所佔的地位。他着力研究俄羅斯過